

王培友 著

宋诗品格与

两宋文化生态

SONGSHIPINGEYU

LIANGSONG

WENHUASHENGTA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培友 著

宋诗品格与

两宋文化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王培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61 - 7070 - 0

I. ①宋… II. ①王… III. ①宋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3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40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2HQ01

序 一

韩经太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是一个极有探询价值的学术选题。之所以如此断言，当然是因为此间所谓“文化生态”已然涵涉两宋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地域文化诸领域，从而总体上呈现出“文化诗学”的研究风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宋诗品格与宋型文化”的当下重大课题。选题的价值中已然包含着作者的眼光和见识，王培友博士以此为自家专著之标题，积数年学术钻研之心得于一体，学林读书人可以有所期待。

不言而喻，关于宋诗品格的诗学阐释，不妨在以下两种阐释模式中选择其一：或者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唐宋诗比较论”的视阈下展开讨论；或者在文化诗学的视阈下以“宋型文化”为生态环境来探询宋诗所以如此的文化成因；两者之间，最终又是高度关联的。眼前这本书的学术视角，显然属于后者。一般说来，在学理背景的深入探究过程中，其所谓“两宋文化生态”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联系到“唐宋变革论”所引发的历史转型问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10年提出“唐宋变革论”，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百年过去了，如是“内藤假说”影响下的近年“宋型文化”说，依然恪守“唐宋变革”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学术百年以来逐渐深入的唐宋比较论，缘此而能够以超越“朝代”的眼光去通观“大历史视野”里“宋型文化”的“历时生成”特性。虽然，这本书的研究尚未进一步追寻上述这样的深层问题，但作者所设置的“文化生态”这样的研究视角，本然地具有宽广深邃的探询空间。这也正是其选题所含有的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众所周知，宋代正当心性儒学复兴之世，在唐宋通观的意义上，有儒学复兴语境下的“古道”与“古文”的渐入主流；在宋明通观的意义上，有理学成熟语境下的“文以载道”与“明心见性”的深入人心。“两宋”时代，可以阐释为“唐宋转型”之两宋，也可阐释为“宋元替代”之两

宋,还可以阐释为“宋明一脉”之两宋。无论如何,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理想,是建立在心性儒学之所谓“孔颜乐处”基础之上的。文艺思想问题不等同于理学思想问题,但必须连通于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士大夫精神生活。惟其如此,关注于理学思想观念及其相应范畴、命题究竟如何转化、移植为文学艺术思想领域的概念或命题,尤其关注以“孔颜乐处”为标志的儒家人格理想在具体投射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时所生成的关键性问题,比如贯穿两宋文艺思想发展史之始终的“平淡”诗学观、“逸品”画学观与心性儒学之人格意象“光风霁月”的精神内涵,如此等等。与此相关的学术探讨占有《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一书的一半篇幅,而且是该书中的精彩部分。包括诗歌文化功能、士人文道观念和理学文化思潮的篇章,均与上述题旨相关,相信作者的论述和见解将有益于学界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辩。

诗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核心课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世界里,诗歌作为“纯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其作为“诗教”载体的“文化功能”之间,是一体不二的。问题在于,悠久的诗教传统与当时的政治生态之间,往往处于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的历史矛盾之中,缘此而使很多问题显得纠缠难明。《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的作者,在关注两宋政治文化生态之际,不流于泛泛而论,每能选中典型政治事件,通过诸如对“车盖亭诗案”等关系到士大夫群体政治命运的事件的因果剖析,透视士大夫文人在特定政治文化生态制约下的诗学心态,颇多启人深思的地方。其中一些事关当年“党争”细节的深入剖析,入情入理,使其最后的判断具备相当的说服力。

一般说来,宋代作为中国科技史描述中的鼎盛时期,科学技术文明观念中包含着客观“体物”而又“传神”“写意”的文艺精神,包括道家醉心于“吟风弄月”的诗性精神生活,其中就含有体悟天地万物之“生意”的“体物”精神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联系宋代文艺家与理学家共同倡言“吟风弄月”的典型事实,进而探究其与理学“格物致知”命题的内在统一性,结合北宋诗坛“禁体物语”的诗学实质,提出宋代文艺思想体系之构建究竟是“尚意”的一元论还是“意新语工”所蕴含的表意体物之一本二元论问题,应该是“宋诗品格”阐释的题内应有之义。本书作者关于理学家言说之“气象”亦具诗学品格的阐述,不失为一种学理自洽的有益尝试。在类似涵涉深广而又思理深邃的问题上,如何参照

当年王国维所谓唐人崇尚自然而宋人同时兼有技术之美的美学判断，从梳理源自先秦原始道家“道法自然”说而经由魏晋南朝《文心雕龙》之“自然之道”观的中国“原道”主义文艺思想传统，继而概括两宋文艺思想之“有道有艺”说、“技道两进”说的思想实质，最终为整部两宋文艺思想史确立主导理路和价值标准，留待我们探询的未知世界是非常宽广而深远的。本书所论，已然有所涉及，也为作者自己的可持续研究埋下了伏笔。

今年初春，国家总理在与中央文史馆馆员的交谈中，共同提到很多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偏”了！“偏”的反面是什么？世人常言，有“以偏赅全”，有“偏听”与“兼听”，有“偏激”与“中庸”，如此等等。克服“以偏赅全”的全面把握之所谓“全”，是一种在实践创造中与时俱进而无限扩容的“全”；克服“偏听”的“兼听”，指的是多元主体自由探讨的学术生态，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研究主体的辩证思维方式；而克服“偏激”的“中庸之道”，实质上是一种有容乃大并中正和合的成功气象。宋代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成变创之关键期，宋诗品格的阐释，因此而必然富有集大成以创新构型的深刻意义。本书之所见所识，自然是这种学术集成事业中的一部分，是值得嘉许和鼓励的。

2015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

序 二

赵敏俐

宋代诗歌是继唐诗之后中国诗歌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它是在唐诗基础上的发展，又以其不同的时代风貌与唐诗交相辉映，当然也引起了自南宋以后的唐宋诗之争。鉴于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少有争议的崇高地位，如何认识宋诗就成为千年以来学界不断讨论的话题。近年来，关于宋诗的研究不断深入，宋代诗歌迥异于唐代诗歌的艺术与文化特质也逐渐被揭示，“宋调”也因此成为与“唐音”并立的诗歌范式而被学界所认可。然而，如何从更深更广的文化层面来认识宋代诗歌，还有着巨大的开拓空间。

《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一书，正是培友博士力图在当下宋诗研究丰硕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宋诗所以异于唐诗者，学者们已经从多个层面进行过讨论，从“性情”与“才学”之别，到“盛唐气象”与“宋贤精神”的对比，从作品风格到艺术技巧上的差异，从社会变革到诗人心态的不同，等等，都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而培友博士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宋诗。他认为宋诗之所以异于唐诗而别开新境，是因为宋代有一个不同的唐代的“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宋诗，形成了独特的“宋诗品格”。

我们知道，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近三十年来的基本方法，它是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认识文学的一个突破，由此大大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以宋诗研究为例，近年来人们已经从两宋时代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特别是宗教、哲学、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宋诗的生成与特点做过很好的论证。那么，培友博士在此书中引入“文化生态”的概念并作为宋诗研究的突破点，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是将上述文化不再看成是宋诗生成的“背景”，而将其看作是直接作用于宋诗生成的有机要素；它不仅是从宏观上

决定宋诗创作的文化条件，而且是相对微观的环境条件，甚至是直接作用乃至渗透于诗人的写作动机、诗歌主题以及诗体结构中的一种内在的东西。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宋诗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艺术特质，进而探讨其生成的过程及方式。由此，作者在对宋诗进行总体把握基础上所概括出来的“宋诗品格”，也有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涉及诗歌的内容，诗歌的境界、气度、精神，也要涉及诗歌的题材、主题、审美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既是对以往关于宋诗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也是一种新的综合和系统化。

如此说来，关于宋诗品格与两宋文化生态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题目，如何进行把握同时也成为对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考验。培友博士对此做了很好的处理。第一是选取了最能体现宋诗文化生态的几个大的方面，第二是关注焦点问题，在每个大的方面中选取了一些特殊个案进行研究。这样既避免了宏大叙事所带来的空疏，又将这个大的题目做到了细处。举例来讲，如宋初诗坛上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所以流行，与统治者的提倡、君臣唱和、馆阁唱和有重要联系，自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出则诗风为之一改，这其中自有多种原因，学界也有探讨。培友博士通过对台谏制度设立、田锡、范讽、范仲淹为台谏官等事件进行考察后认为，在北宋，似乎有一条“台谏官—政治主张—历史事件—士人呼应—士人气节”这样一个互相关联的历史主线存在。而士人气节的追求，又直接催生了士人的功业心态、帝师心态、闲适隐逸心态等，并内化为士大夫的典型文化人格。台谏官的讽谏主张往往形成政治事件，由此而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重大政治措施、政体变革和社会风气变化的导火索，由此影响士人心态。同时，台谏官的遭遇，往往也对诗歌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认为，将台谏制度纳入宋初百年诗歌发展的考察视野，由此来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生、宋人在诗歌创作中对文道观念态度的变化、诗歌创作心态的变化和艺术审美风尚的转变等现象，就会有一个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明晰的认识。再如，“文道观念”是两宋诗人诗学思想的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此重视不够，提起文道观，往往以理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和程颐的“作文害道”以概之，并由此而产生了对于宋代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批评，很少对宋代诗人群体的文道观进行系统的分析。培友博士认为，从两宋士林群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分为“文章之士”、“传统儒学之士”和“道学之士”三类，他们各自对于“文”与

“道”的理解都有差异，其文道观念既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文章之士在文道观的讨论中更为重视“文”的独立性和本体地位，道学之士的文道观中既有重道轻文的一派，也有文道两分的一派，传统儒学之士则侧重于从现实生活体用的角度来认识文道关系。因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道观念，这三类士人的诗歌创作也因此而不同。正是这三种类型的文章观念的互相激扬，才最终形成了宋人文道观念的时代特征。他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文道观念是宋人诗学思想与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为什么宋诗的品格与文道观念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培友博士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文化生态是个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内容，也包括了观念的和心态的内容，为此他选取了制度文化、政治事件、地域文化、诗歌功能、文道观念、理学思潮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更大范围地概括宋代诗歌文化生态的诸多方面，并通过个案的解剖，来说明两宋文化生态对宋诗品格生成的多维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诗歌品格与文化生态发生关系的途径与机制。培友博士认为：“诗歌品格——文化生态”发生关联的途径与机制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实践主体与创作主体的同一性身份。当创作主体试图表达这些社会身份属性特征的时刻，诗歌品格包括题材、内容、主题、风格以及表达形式、审美追求等，其实已经是被内在规定的文化特性所决定。其二是创作主体的诗歌功能认知和实践。创作主体的生活诉求与人生理想实现的需要，往往导致创作者借诗歌的形式来实现。其三是实践主体以审美的方式实现文化生态与诗歌品格的会通。而这种审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又是密不可分的，这使它在与传统的对接中实现并由此展现出自己的个性。这体现了作者试图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学术架构的可贵努力。

从两宋的文化生态入手来研究宋诗品格，这是一个充满了创意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如作者所言，本书中所讲的文化生态既包括物质的、制度的，也包括观念的、心态的，具体来讲，本书中所论及的文化生态就有文化制度、科举制度、地域文化、文道观念、理学思潮等等。而所谓品格，涉及诗歌的境界、气度、精神、题材、主题、审美取向等，两者都是复杂的概念，因此，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我看来难度实在有些太大。培友博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关注焦点问题”和“散点透视”的方法来对本书进行把握和论述，并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相对于这个大课题而言，这种关注焦点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方式，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完成这个大课题的初步探索。关于宋代文化生态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而宋诗品格的诸多方面，本书也有好多方面没有论及，相应的，有的阐述也还不够透彻。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的结合中建构一个新的理论阐释体系，还需要在更多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宏观的把握。在这方面，作者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不过，本书能够达到现在的程度，也已经非常不易了。

培友博士有很高的治学理想与人生志向，2005年起跟随我学习，其博士论文题目即为“北宋前中期诗词风貌与文化生态”。在读书期间，他刻苦勤奋，研读原著，几乎遍览了北宋文人别集和后人所编宋代诗文总集，为他的宋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又注重理论修养的提高，认真学习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思考问题，力求在学术研究中将史与论结合起来，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2008年博士毕业后又到北京语言大学跟随韩经太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在韩老师的指导下有了更大的进步。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培友请我作序，我很高兴。略书如上，为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培友再接再厉，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5年5月30日于会意斋

目 录

序一	韩经太 (1)
序二	赵敏俐 (1)
绪论	(1)
第一节 “唐宋诗之争”、“宋贤精神”与宋诗文化属性	(2)
第二节 宋代诗歌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的学理基础	(7)
第三节 诗歌品格、文化生态及宋诗文化生态部类	(11)
第四节 研究理念及研究视角：散点透视与关注焦点问题	(23)
第一章 两宋政治文化制度与诗歌品格	(27)
第一节 两宋台谏制度建设与诗歌之变迁	(28)
第二节 两宋科举制度对诗歌发展之助力	(42)
第三节 两宋乐府制度、歌妓制度与诗歌审美取向	(59)
第四节 两宋曲宴赋诗制度与花卉题材诗歌审美诉求	(65)
本章小结	(74)
第二章 两宋政治事件与诗歌品格	(77)
第一节 宋初“文治”与“宋初三体”诗歌诉求	(77)
第二节 “进奏院案”与北宋中期诗歌流变	(86)
第三节 “车盖亭诗案”与北宋后期诗歌走向	(96)
第四节 “靖康之变”与南宋初期诗歌主题	(112)
本章小结	(125)
第三章 两宋地域文化与诗歌品格	(126)
第一节 宋初地域文化特质与诗歌审美诉求	(126)

第二节 北宋洛阳地域文化与居洛诗人诗歌主题	(140)
第三节 两宋京城士人交游与其诗歌创作的趋同性	(158)
第四节 两宋不同地域娱乐游玩风气与诗歌风貌	(168)
本章小结	(177)
第四章 两宋诗歌文化功能与诗歌品格	(179)
第一节 宋初百年偈语诗的文化功能与诗性品格	(179)
第二节 欧阳修诗词题材差异与诗词功能分工	(189)
第三节 “因诗求道”与黄庭坚诗歌的类型化特征	(200)
第四节 两宋礼仪诗歌文化功能与诗歌品格	(222)
本章小结	(232)
第五章 两宋士人文道观念与诗歌品格	(234)
第一节 两宋“文章之士”文道观念与其诗艺追求	(235)
第二节 “道学之士”文道观念及其诗歌品格	(252)
第三节 “传统儒学之士”文道观念及其诗歌品格	(281)
本章小结	(296)
第六章 两宋理学文化思潮与诗歌品格	(298)
第一节 两宋理学文化思潮与理学诗发展历程	(298)
第二节 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境建构	(309)
第三节 两宋“理学诗派”诗歌的理学主题及其诗歌品格 ..	(322)
本章小结	(334)
第七章 两宋文化生态与宋诗品格之关系	(336)
第一节 两宋文化生态对宋诗品格生成的多维作用	(336)
第二节 诗歌品格与文化生态发生关系的途径与机制	(341)
参考文献	(346)
后记	(354)

绪 论

宋代诗歌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术界对唐诗风貌、品格的认识高度一致相比，千余年来，人们对于宋诗品格及其历史地位的判定却是迥然有别的。褒之者认为宋诗文化底蕴深厚，涵蕴广博；贬之者则认为宋诗缺乏真性情，病在无意兴。围绕着对唐宋诗特性和历史贡献等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持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而饶有趣味的是，不管是否推崇宋诗，“宗唐派”与“宗宋派”大都承认，宋诗与宋代政治制度、宗教、哲学、艺术等相互交融，外显为宋代诗歌迥异于前的独特艺术风貌。近现代学者亦逐渐承认，宋代士人着眼于“文道”关系而从观念到创作的诗学实践，以其极富思辨性、哲理性的独特审美取向，成为泽被深远的不朽诗歌范式。可以说，宋代诗歌所蕴涵的“宋诗范式”、“宋人作风”及“宋人气象”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由此而言，对宋诗品格及其生成的发展历程、成因等问题进行研究，踵继先贤而“接着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作为已经成为“显学”的宋代诗歌研究，近三十年来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因此，要想入渊探骊，必须在治学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才行。

作为“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两宋诗歌，作者众多，作品丰富，风格多样，诗学命题及其流变相当复杂，这些特点与彼时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并且，两宋三百多年的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思潮等在内的文化诸部类，也处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对两宋诗歌作者及其诗歌创作施加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一方面注定了本书研究内容是丰富、饱满的，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本课题的研究之路必定是艰辛、困难的。

考虑到研究对象内容的丰富性，本书力图从两宋历史语境的文化生态视野下，探讨这一时期诗歌品格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因素、状况，研究两宋诗歌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本书研究既涉及文学本位研究所必须面对

的问题，如两宋诗歌创作主体、诗歌作品、诗歌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诗歌范型、主题、诗格类型、审美品格，以及两宋诗人文道观及其创作实践的矛盾性问题等；也涉及文化生态部类与诗歌走向及品格生成的关系问题研究，如两者的沟通渠道、会通方式、诗学范畴的内涵流变等。

本书研究对象内容的丰富饱满，也对其研究方法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为了实现研究目标，笔者打算按照历时性与共时性兼顾、历史的美学的逻辑的统一的原理，借鉴中国古典艺术的“散点透视”原理，从两宋诗歌发展进程及影响诗歌品格生成因素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若干“焦点问题”，构建课题研究的“点”与“面”，而大致以历史进程为主线，考察两宋“文化生态”对“宋诗品格”产生作用和施加影响的“关节点”以及作用渠道等问题。

按照学术惯例，本“绪论”重点探讨课题研究的客观性基础，界定课题研究所用的术语、概念，交代课题遵循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为本课题正文部分的相关研究奠定客观的、科学的学理基础。

第一节 “唐宋诗之争”、“宋贤精神” 与宋诗文化属性

研究宋诗，自然要提及“唐宋诗之争”。自南宋以来，围绕着唐宋诗高低之甄别，事实上成为了后世诗人学习诗歌创作的取法基础，影响到宋代以降的诗歌乃至文学的发展。直到今天，围绕着“唐宋诗之争”而展开的古老话题，仍然经常泛起学术争论。因为“唐宋诗之争”事关前人对宋诗品格的总体把握，也涉及对宋诗历史地位的认定，因此我们对宋诗品格的探讨，也必须从这一重大文化现象说起。

如果我们不再纠结于唐诗与宋诗孰优孰劣的判断，亦不从艺术本位来分析唐宋诗之长短的话，那么，“唐宋诗之争”这一话题仍然会为我们提供很多信息。自20世纪以来，有赖于齐治平、王英志等学者的辛勤研究，我们对绵延千年的“唐宋诗之争”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

“宗唐派”特别重视唐代诗歌抒发“情性”，强调“求真”。如严羽《沧浪诗话》强调：“诗者，吟咏情性也”，推崇唐诗以“兴趣”来实现“言有尽而意无穷”，批评宋诗追求“文字”、“议论”、“才学”而疏离

“情性”^①。金代王若虚又提出：“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②则颇有对宋诗行全面否定之嫌。到了后世，这一看法逐渐走向极端。清人沈雄引陈子龙语，认为：“言理而不言情，终宋无诗”^③，清人顾炎武更是强调“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更注重诗歌的抒情本质、诗歌的人生价值以及诗歌的未来这些根本性问题”。^④王夫之则拈出“意”、“情”来批判宋诗之短处：“宋人拚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⑤至此，宋诗优长已经被完全搁置。与之相应，从推崇诗歌的艺术性出发，“宗唐派”对唐代诗歌重视“意兴”、强调诗歌“气象”、重视使用形象思维等艺术特质，给予正面评价。如严羽指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指出唐宋诗差异在于“气象”，实开了后人以此评价之法门。刘绩发挥为：“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⑥李梦阳则举“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⑦。于抑扬之间，“宗唐派”之“宗唐”标准与审美取向表露无遗。可以说，“宗唐派”对宋诗的批评，大都是立足于诗歌艺术特质，而主要从诗歌审美特性、诗意表达方式、诗歌风格、意境构成等方面来展开对宋诗的考察，从而得出宋诗不如唐诗之结论。不过，基于诗歌艺术本位的判断，固然是唐诗的胜处，但是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把这些判断标准观照于《诗三百》、楚辞、汉诗、魏晋诗歌乃至现代诗歌，也是可以的。从这些角度来认定唐诗的特质，很难说是唐诗的“这一个”品格。不得不提及的是，宋诗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实践产物，由于时代文化风潮下诗词的分工，诗歌社会功用的拓展，为消费而写作诗歌风气的兴盛等，导致了宋诗与彼时文化环境、文化思潮和文化风尚愈加紧密结合。而此一点，是

①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② 王若虚：《滹南集》卷三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465页。

③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6页。

④ 蒋寅：《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⑤ 王夫之：《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⑥ 刘绩：《霏雪录》，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689页。

⑦ 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46页。

“宗唐派”所忽略的：罔顾宋诗的实际而以普泛化标准来评判宋诗与唐诗的优劣，显然是不全面的。

与之相反，“唐宋诗之争”之“宗宋派”则肯定宋诗的“理”、“才”、“博”及“会综”、“融合”等特征，强调宋诗因重“变”而求新，因思理精深而光华外显等特质。明代袁宏道就强调：“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①，点出宋诗特有的文化品格。许乾学在《宋金元诗序》中也强调指出：“宋元人诗，风调气韵，诚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②这里，“功深力厚”是从宋诗包容经史子部，宋人自铸伟词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清代同光体诗人陈衍则通过对开“唐宋诗之争”滥觞的严羽之批评，对诗歌应当是“诗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这一原则问题展开过讨论。他指出：“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吾甚疑之。以为六义既没，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义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③此中所论，显示出“宗宋派”诗人对于宋诗文化品格的自觉认同。宋诗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品格，被清代翁方纲称之为宋诗所涵蕴的“宋贤之精神”^④。

现代以来，受西方哲学、美学等现代学科相关理论的影响，人们多注意从辩证、学理等角度对“唐宋诗之争”作出判断。20世纪以来，缪钺、程千帆、钱锺书等先生的精当评论，提升了人们对宋诗品格、艺术类型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如缪钺《诗词散论》中有《论宋诗》，大略云：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

①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9页。

② 转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 陈衍：《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7页。

④ 翁方纲：《石洲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